



青年学者文丛

国现代 学术话语的形成

◎ 彭发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者文丛



翻译与中国现代 学术话语的形成

◎ 彭发胜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 / 彭发胜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308-08373-7

I. ①翻… II. ①彭…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3924 号

翻译与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

彭发胜 著

责任编辑 张作梅 (zhangzmei@sina.com.)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3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373-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特别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



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与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



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



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以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



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大陆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欧化趋向略论

——序彭发胜博士《翻译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

辜正坤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现代文化的诞生与建设无一刻不伴随着翻译。

没有翻译,就没有现当代中国文化。

那么,什么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其主要特色是什么?

简要地说,所谓现当代中国文化包涵现当代中国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文学、艺术、伦理、教育、科技等许多方面。它和前此近三千年来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它的主要特色是:欧化,或曰西化。在上述所有这些领域内,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压倒性的。

当然,西方文化本身又可以分成若干种形态,它们各自影响中国文化的程度又因具体时空条件的差异而有相应的差异。比如说,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现实派(或理性派)西化影响占上风,在五四运动以后,理想派西化(马克思主义西化)的影响愈益增大,现实派西化影响渐渐式微,到1949年的时候,理想派西化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全面占领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一切方面而达到全盛时期。从1949年到1978年,理想西化派独大的情况有所改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49年前曾盛行过的理性西化(现



实西化)理念渐渐与理想西化理念合流,到本世纪初,出现了两种西化理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并存的格局。在这种格局的背后,不用说处处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理论的影子。

整体上看,这两派所致力建设的文化,就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理念及架构,基本上都是借用自西方文化的。但同中亦有大不同处。例如,现实西化派虽倡理性,并不排斥宗教;理想西化派则独标科学,排斥宗教,因此在文化建设理念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独特的西化。这种更为独特的文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由于上述原因,这种现当代中国文化确实体现了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断裂,尽管它的某些方面还有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但是就其整体而言实际上是某种西方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变结果,或者说,是西方文化的南橘北枳式的变种。

到此为止,我们不得不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这就是:不管是理性西化派还是理想西化派,都有意或无意地把批判、抵制传统中国文化作为自己的理所当然的任务。这种批判首先是从大量新概念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文化而开始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打着翻译的烙印。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文学的、艺术的、教育的,乃至医学及所有的科学门类中,都充斥着新的欧化(西化)概念术语。

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自佛学东传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文化大变革。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它的正面和负面寓意。我只是想提请读者注意到这一巨大的文化输入或曰文化嫁接过程中的翻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彭发胜博士的著作《翻译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形成》可以说正好契入了这个问题的关键。

学术话语是一种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核心。它的演变昭示着该种文化体系的走向。在学术话语体系中,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方面的概念更新意



味着深层次的变革。因此，每一个这种新概念的翻译引进都潜存着变革的基因。当这类概念的积累达到必要的规模并且具备系统性时，精神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开始了，思想的山洪演化为社会的山洪；大动荡、大变革，成为一个民族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

人们易于简单地把某种结局归因于个别的人物、个别的事件、个别的思想，却很少有人从最简单的翻译话语体系方面入手来探寻这些人物、事件、思想背后话语概念的推动作用。一个概念是一道涓涓细流，千万道细流却可以汇成思想的汪洋。以中西语言体系差异而言，绝大多数的西方文化概念都难以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准确的对应语。因此几乎每个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化概念或术语与其母语中的概念或术语相比较都有某种程度的误差或某种潜在的误导性质。这些细小的误差由于分散在千万个概念术语个体中自然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文化效应不是只有很少发生的可能性，而是会势所必然地发生。渐进的积累产生人们无法阻挡的习惯势能，最终使一种文化彻底转向。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种转向就是欧化，或者准确点说：变形的西化。

变形或变态的西化何以会必然产生？南橘北枳的现象为什么会必然产生？原因当然不只一个，但是大量西方文化概念术语的一系列误译一旦积淀到一定程度，难道不会在嫁接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留下异变因子、或至少对中国的变形西化文化的发展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回答是肯定的。

实际上很多年来，我都想写一本学术专著来系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时间限制及若干别的许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使我无法抽身致力于这项研究。所以当年彭发胜博士将这个题目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时，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终于有中国学者可以系统地来研究这个重大的课题了。

但是彭发胜博士基本上是按照他自己的思路来设计其研究框架的。在



在我看来,彭发胜博士的论文以文化三元层级空间与学术维度为论述框架,以重新界定的翻译概念为主线,以相关学者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关于科学观念和方法论有关的内容为论述对象,通过学术史考量与话语分析,相当有力地阐明了翻译在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文章就作者相关的论题,侧重探讨了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与金岳霖这五位颇具代表性的学者。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学者从科学获取力量,把引进西学作为中心主题之一。翻译行为及翻译理念在其中起了关键的桥梁、贯穿作用。同时引进西学这个主题在民族屈辱与生存危机的压力下,经过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表达为唯科学主义。以科学观念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整理国故成为现代学术的重点之一,并由此排斥了形而上的“道”的维度。从严复到胡适,本体论式微的趋势走到了谷底。但是,在现代学术制度基本建立之后,金岳霖《论道》一书代表了中国文化本体论一阳来复的迹象。另外,实证主义内在具有的怀疑精神表现为学者之间的否定批评与超越(或部分超越),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多维合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作者从翻译的角度来如此深入地探讨现代中国学术话语的形成,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很有创见,确实是目前这个领域颇为难得的具有领先意义的研究成果。

值得指出的是,彭发胜博士不仅精通英语、英语文学和翻译理论,他对于西方哲学也有相当深的造诣。他最初的博士论文曾试图以胡塞尔的现象学原理来阐释翻译文化现象,初稿在侧重介绍现象学原理方面已经写了好几万字,并且确实颇有心得。但是,由于其专业方向是翻译学与比较文化,我还是建议他先把重心放在与专业方向联系更紧密的选题上,结果他选择了眼前这本书的课题,并做出了可喜的贡献。他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有非常突出的理论意识,因此我断言他必定可以在将来做出很重大的学术贡献。

当然,就他目前从事的这个课题而言,虽然在深度上已经很可观,但是



其研究范围还可以囊括更广阔的学术空间。例如,如果以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艺学等学科分类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无疑还可以获得重大斩获。我相信随着这部学术著作的出版,彭博士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写出更精彩的学术专著。

是为序。

2010年7月于英国伦敦



目 录

总 序

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欧化趋向略论(辜正坤 序)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空间和学术维度	16
第一节 传播与文化空间	16
第二节 学术维度	27
第三节 人物谱系	32
第二章 严复的三重使命	37
第一节 也说严复的用心	41
第二节 《天演论》的厚文本	45
第三节 译名之难	73
第四节 严复译名的分类与辨析	77
第五节 传播科学观念与科学方法	98
第三章 王国维的学术观和方法论	124
第一节 哲学与科学	124



第二节	在翻译与著述之间	134
第三节	二重证据法的哲学基础	147
第四章	梁启超的译论和方法论	152
第一节	康梁之间:仁爱与尚通	152
第二节	译论和新语	156
第三节	进化与分析	169
第五章	胡适的平等主义和方法论	186
第一节	普遍平等主义	186
第二节	译论与翻译	197
第三节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211
第六章	金岳霖的哲学观和语言观	223
第一节	面对休谟问题	225
第二节	几对重要概念	227
第三节	“永真”的归纳原则	239
第四节	理有固然,势无必至	243
第五节	语言观和翻译观	250
结 语	260
附 录	267
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96



前 言

一个生命体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吸收消化外在的成分。一个人如此，一个文化也莫能外。所谓外在的成分，概言之包括物质和思想两部分。物质的东西一般可以直接拿来派上合适的用场，如中古时期中国移植西亚的植物，西方利用中国的四大发明，虽不免要适应水土，因地制宜，其功用往往会立竿见影。思想的引入却非如此，必须要跨越语言的障碍，翻译在其中不可或缺。季羨林曾形象地把中国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虽然有时水多，有时水少，但从未枯竭，这是因为大大小小的新水多次注入，“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翻译是中华文化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因此季先生感叹：“翻译之为用大矣哉”^①！

“从印度来的水”指的是“自晚汉迄盛唐约六百年间”^②佛典的翻译；而“从西方来的水”则主要是1862年设立同文馆以来西学的引进和翻译^③。如果以中国文化通过翻译接受佛教的历史进程为参照，一百多年来西学的持续引入还没有达到一种充分的状态。一个很显著的标志是，佛典的翻译促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而宋明理学则融摄了禅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圆顿法门，才得以赓续儒家重德厚生的传统。通过西学的引进和翻译，中国人建立了并正在建设着

① 季羨林：《“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载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第3页。

②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第169页。

③ 明末清初，西方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了一些西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名理探》，乃是西学东渐的滥觞，不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小。